

从省港澳地域观察孙中山的 求学与革命

香港浸会大学 李金强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为其立志救国，从事革命的缘起。故每为史家所关注，纷纷对其此一时期的生活及思想进行研究^①。较著者如罗香林研究孙氏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历程及所结识师友与其革命的关系^②；陈锡祺探讨香港、珠江三角洲及檀香山对孙氏革命思想的影响^③。简又文论述孙氏于香山、檀香山及香港三地的生活与革命的关系^④；而庄政则以孙氏接受大学教育前后，于香山、檀香山、香港、广州、澳门各地活动，及师友对其革命思想影响作出研究^⑤。就西方学者而言，早有 Paul Linebarger 指出翠亨村及省港澳对孙中山生活的影响^⑥。而更值得注意的为 Harold Z. Schiffrin 对孙氏于檀香山、澳门两地活动关系及香港师友对其革命思想启迪的精详研究，并首先指出基督教信仰与孙氏革命思想、活动具有密切的关系^⑦，Marie-Claire

① 李金强：《孙中山之早期——农业改良言论探讨（1887~1895）》，《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第145~155页；王杰：《孙中山研究》，《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94~497、511~513页。

② 罗香林：《国父的大学时代》，台湾商务印书馆，1956，第27~93页。

③ 陈锡祺：《同盟会成立之前的孙中山》，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第14~31页；《关于孙中山的大学时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第35~64页。

④ 简又文：《国父的青年时期》，《新希望》1955年第55期，第5页；1955年第56期，第5页；1955年第57期，第9页；又 Jen Yu-Wen and Lindsay Rise, *Sun Yat-sen: Two Commemorative Essays*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7), pp. 1-22。

⑤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5，第12~157页。

⑥ 林百克 (Paul Linebarger)：《孙逸仙传记》，《中山全集》第1册，良友图书公司，1931，第1~13页。

⑦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10-13。

Bergère 则从清季沿海通商口岸如省、港、澳的边陲新文化地带分析孙中山革命思想与活动的形成^①。

上述学者对于青少年时期孙中山的研究，无疑使吾人认识省港澳之地环境对孙氏革命思想与活动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即以上述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省港澳的地域网络作为研究取径，借此重新检视青少年时期孙中山的求学与革命，增加吾人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与活动的新了解。

一 成长环境——省港澳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部，为东、西、北三江的出海地带。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设县，此后直至嘉道年间（1796~1850），中原移民相继南下，生齿日繁，而本土经济遂得以发展。时香山县之金星港，准许外轮停泊，又因其毗邻葡属澳门及英属香港，遂得以吸纳外来文化，风气日开。及至清季，随着人口增长，土地不足分配，具有出海冒险及外向流移精神的香山县民，相继移民海外谋生。时值檀香山发展蔗糖与稻米种植，并因县民陈芳、程汝楫在檀经营蔗糖，商贸成功，吸引了不少同乡透过亲属关系及契约华工方式，于 1852~1898 年间移民檀香山，以该地为谋生致富之圣地^②。自是士、商人才辈出，其中尤以商人、买办、留学生、华侨最为著称^③。

香山邻接广州、澳门、香港，三地均为明清两代华南地区的著名对外贸易港市。借物产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为其腹地，进而联结中外，促成经济及文化的交流。至近代遂成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及中西文化荟萃的滨海新地域^④。

① 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41.

② 香山华侨以来自檀香山及澳洲最为著称。参见叶显恩《香山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黎志刚《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 91~122 页。香山籍澳洲华侨的经济活动，可参黎氏一文。

③ 吴冉彬：《香山热土的文明历程》，胡波：《香山与近代中国》，载《香山设县 850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 21~28、91~96 页。清末民国香山名人辈出，除孙中山父子外，尚有容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唐绍仪、王云五、吴铁城等。香山商人尤其闻名全国，参黎志刚《香山商人的冒险传统》，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第 433~450 页。

④ 关于省港澳三地为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参郑天祥等《以穗港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经济地理网络》，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1，第 22~40 页。汪荣祖《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第 88~89 页）指出港、澳为英、葡所占，中、西交汇，以广州为中心之珠江三角洲，则为国学茂盛之地，该区由是中西文化汇聚。

就省港澳地理形势而言,广州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而香港与澳门分处于珠江出口入海的东西两岸,呈一三角形地带。广州处于锐角尖,港澳分处两侧而成前卫的态势,三地随着时势推移,其发展过程,遂产生分合互补的动能效应^①。

广州为广东省省会,乃该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汉代以降,已具城市规模,且为华南对外主要贸易港。至唐代设市舶司,番舶云集,始设蕃坊,让外人聚居,贸易至盛。至明清,欧人东来贸易,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采行闭关政策,指定广州一口通商,遂得以独占对外贸易。及至鸦片战争后,依据条约,清廷割让香港及开五口通商,广州为五口之一,遂成条约港口(Treaty Port,或称通商口岸)。而其对外贸易的地位,渐为他口如上海及香港所夺。可是广州港市贸易的特性仍然持续,实为历久不衰的“长春”港市。欧美基督教差会如美部会、伦敦会、浸信会、长老会及三巴会相继派遣传教士,由香港入粤建堂宣教,并开办教育、医疗及出版等教会事业,西方文化由是植根广州^②。

澳门为珠江口外的泊口。至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于葡萄牙租借澳门,其地始见显达。明清两代,辖属香山县,在“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地方行政体制及葡人租借管治下,逐渐发展对外贸易,凭借帆船贸易,通航欧、美、亚各大洲,于16、17世纪成为华南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随着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东来开教,遂成为天主教来华宣教的前哨站,中西文化由是交汇于当地^③。

至于香港,明清时隶属新安县。由于地处海口,向为中外海舶会集之港地,至唐代屯兵驻防,遂以屯门一名著称^④。及至鸦片战争后,由英国占领

① 李国祁:《由近代港澳的发展论商业殖民的特征及对华影响》,《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第1~2页。

② 陈正祥:《广东地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78,第181~205页。传教士至粤开教,其历程乃先于澳门落脚,继于鸦片战争后移至香港,再进入广州宣教。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140~187页。

③ 黄鸿钊:《澳门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第61~66、102~114页;参见李国祁《由近代港澳的发展论商业殖民地的特征及对华影响》,第4~7页;霍启昌《“澳门模式”与近代中西关系》,《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43页。明代地方官员驭夷,然建立一套防御机制,允许葡人留澳,以汉法治之,又驻兵关闸,防夷入侵,并设专官及制定规例,管理澳门一切华夷事务,严加管控。此即“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之谓也。霍氏称之为“澳门模式”,下开清代广州通商的贸易体制。

④ 罗香林:《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国学社,1959,第21~46页;霍启昌:《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香港》,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1997,第37~58页。

而成为其殖民地。凭借优良港口的地理条件，并在殖民地政府采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下，随着 1850 年代以降，国内动乱不已，导致大量人口南移，人力、财力结集于本地。兼且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后，加开通商口岸，扩大国内贸易，遂刺激本港商贸航运发展^①，而近代市政，如卫生、警察、新式教育以至银行、轮船交通的相继建设，使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与亚洲、澳、新、欧、美各地间的转口贸易及航运枢纽，从而由“一块石头变成世界上重要的转口港”^②。与此同时，近代西方文明诞生地——英国的政教亦随之移植本地，使香港具备西方三权分立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而英国伦敦会、圣公会和美国浸信会、公理会等亦相继在港宣教，教育与医疗并重，西方文化，自成一帜并出现大批具有西学新知的双语华人精英^③。香港遂成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文化的窗口。

上述广州、澳门、香港三地同属对外贸易的港市，“夷风染习”，成中西文化交流汇集之地，且为列强侵华的桥头堡，民族主义油然而生，成为革命党的温床^④。故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兼且三地邻接。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人口自由流通，且因贸易关系，三地的航运及陆路交通，相继兴办，得以互通声气。就航运而言，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降，外商组建省港快轮公司（Hong Kong and Canton Steam Pocket Co.）、铁行轮船公司（P&O），以轮船行走省港两地，至 1856 年，省港澳的来往轮船已达 14 艘之多。至 1872 年省港澳轮船公司成立，专营三地航线，而轮船招商局亦加入

① 王韬：《香港论略》，《菰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 37～58 页。王氏谓：“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难至粤者，随海舶来，必道香港，遂为孔道，香港不设关市……行处者乐出其境……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94-196。

② 吴伦宽：《香港自由地位的建立——从一块石头到转口港》，《历史月刊》1990 年第 32 期，第 106～117 页；又清季中港贸易的紧密关系，促成香港的兴起，可参见 K. C. Fok (霍启昌)，“Hong Kong's Economic'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Late China Period,” *Lecture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0), pp. 97-117; G. B. Endacott, “Forward,” *An Eastern Entrepote: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64), pp. VI-XVI。

③ 王韬：《香港论略》，《菰园文录外编》，第 261～262 页；李金强：《胡礼垣与戊戌维新》，《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第 71～72 页；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1, 139-171。

④ 参见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 Mid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1970), pp. 1-6。

竞争。就陆路而言,最具代表性为1911年全长125英里的广九铁路,落成通车,强化中港的接触。而省港澳三地的区域网络亦由是完成^①。

上述近代省港澳三地海陆交通的相互联结及密切往来,逐渐形成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网络^②。此即出生于香山县的孙中山所处的地域。而孙氏一生的生活、经历及其革命事业的思想与活动,乃来往于省港澳三地,并在此一地域、地缘的历史政治及文化氛围下孕育及形成。其中尤以香港最为关键。此即其青年期于此接受中学、医学教育及归信基督教的所在地。孙氏在香港,不但获得了信仰与专业知识,并从而产生其政治革新思想与理念,此即孙氏所谓:“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③遂起而倡导革命,此后从事组党、筹款、宣传、购买军火,乃至策动武装起义,均以香港为大本营。故香港实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摇篮,以及革命运动的主要基地,而香港亦由是取得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中心地位。

二 家乡、侨乡——香山与檀香山

出生于香山的孙氏,由于香山社会的侨乡特性,且因其兄孙眉移民檀香山,得于少年时期前往该地生活,习染西方文化,开启其生命的新视野。日后回归故里,并得以南下香港接受西方教育,故檀香山无疑为其革新思想的起源地。故首述其于翠亨村及檀香山的少年时期。

孙氏于1866年11月12日(十月初六日)^④,出生于背山面海的香山县

① 关于省港澳交通网络的建立,可参见鲁言《香港掌故》,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7,第100~105、167~181页;徐曰彪《近代香港航运业的兴起》,《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2~193、200~205页;Daniel Y. K. Kwan, *Marxist Intellectual and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A Study of Tang Zhong Xia (1884-1933)*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 52-58。又明清以来省港澳经济地理网络的形成,参见郑天祥等《以港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2~95页;广九铁路的修建,参见李恩涵《中英广九铁路的交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3年第1期,第139~172页。

② 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1~189页。

③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第115页。又省港澳及翠亨村对孙中山生活的影响,可参见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孙逸仙传记》,《中山全集》第1册,第1~13页。

④ 孙氏生日初因翟尔苏为其所撰传记,引述为旧历十月十六日,应为误记。依据其妻卢慕贞所出示的订婚八字,始悉孙氏生日为十月初六日,即阳历11月12日。参见黄季陆《关于国父生辰的考证》,《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第1~35页。

翠亨村，父达成（1813～1884），母杨氏（1828～1910），长兄孙眉（1854～1914），二姊妙茜（1863～1955），季妹秋绮（1871～1912）^①。家世务农，自谓：“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②。自幼参与农耕工作，取柴草、捞塘飘（猪饲料）、锄草挑水、放牛及驾艇出海取蚝^③。叔父学成（1826～1864）、观成（1831～1867）两人先后赴美做矿工，客死异地，未能返乡，而长兄孙眉亦于 18 岁时随舅父杨文纳至檀香山谋生，故其家兼具华侨的背景。7 岁时（1872）始行接受传统启蒙教育，进入私塾读书，遍习《三字经》、《千字文》，10 岁入乡塾，从游于陆氏祖祠塾师王氏，继入郑帝根塾读书，受业于程步瀛等人，习四书五经，是以“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④。时孙氏已听闻太平天国老兵谈洪、杨反清轶事，故早有革命之念。且对传统教育重视记诵而忽略理解表示不满，并于日常生活中对不平事物，流露出抗争及好打不平的精神^⑤。

至 13 岁（1879），与母亲杨氏乘“格兰诺”号（S. S. Grannoch），由澳门前往檀岛，投靠乃兄，于航行中“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人之想”^⑥。寓檀期间，为求学习英语，协助其兄发展事业，先后入学意奥兰尼学校（Eolani School）及奥阿厚书院（Oaha College）就读。

意奥兰尼学校，为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Bishop Staley）于 1862 年创

-
- ① 孙满口述、祝秀侠笔记《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第 86 页；并参见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43，第 37～42 页。据孙妙茜的口述资料，次兄德佑（1860～1865）早逝，而长姊金星亦早夭。
 - ②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第 18 页。
 - ③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第 5 页。孙中山家世及其家庭生活，可参见黄彦、李佰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 25 辑，第 275～282 页。
 - ④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47 页；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 14～21 页；又参见《孙公中山在檀事略》（《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3，第 278 页），则谓于冯家祠读书，其师为赖桂山，及程植生诸先生。黄彦、李佰新，谓孙氏子弟，7 岁时未入学，至 10 岁始入学。参见黄彦、李佰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第 283 页。又孙氏曾于 1923 年起津贴其师程步瀛每月 100 元，参见《孙中山全集》第 7 卷，第 296 页。
 - ⑤ 简又文：《国父的青年时期》，《新希望》第 55 期，第 5 页；第 56 期，第 5 页。并参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 19 页；又参见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见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台北，正中书局，1977，第 6 页，孙氏对宫崎说，其革命念头来自太平天国的老兵。
 - ⑥ 孙文：《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47 页；林百克：《孙逸仙传记》，第 52 页；另参见黄彦、李佰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第 284 页，引孙中山堂姊孙娥（孙观成之女）所说，谓孙氏乃于 1878 年春，随同乡郑强夫妇到香港，乘招商局轮船广大（或广利）号约经 25 天航程到檀香山。

办的小学,收生以当地土著为主,兼收亚裔。1873年迁址至贝街(Bates St.),与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为邻。孙氏以帝象一名注册入学,并寄宿于该校,其初华裔学生只有孙氏、钟工宇、唐雄、李弼4人,后增至10人,与钟氏、唐氏最为友好。入读3年(1879~1882),成绩优异,尤好西方传记,对华盛顿、林肯最为景仰。英文进步神速,毕业时获英文成绩二等奖,并由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David Kalakaua, 1836-1891)亲自颁予奖品。孙氏获奖,当地华人社会,亦感与有荣然。其兄更因而将部分财产拨归孙氏名下。在校期间,受到宗教感染,对基督教产生信仰,渐生反对迷信及偶像的观念,亦由此与其兄发生冲突^①。

小学毕业后,约有半年时间在茂宜岛,协助其兄。继而入学美国公理会及长老会合办的奥阿厚书院,原望毕业后至美国升读大学。岂料就读半年后(1882年1~6月),由于认识曾到中国宣教的教师芙兰谛文(Frank Damon),过从甚密,并希望受洗加入教会,且对其兄供奉的关帝像,表现轻蔑言行,遂遭孙眉干涉其信仰,恐其洋化,而最终迫其辍学,重返故乡“补习国学”^②。

正当孙氏旅檀期间,当地政局亦出现变动。时檀香山虽为独立王朝,然由于英美两国势力的介入,在此一情势下,一方面渐受英国君主立宪及美国民主共和的民主思想与体制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具有兼并夏威夷的政治野心,受到当地英人的反对,而夏威夷(檀香山)国王卡拉卡瓦则高呼“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Hawaii for Hawaiian)民族主义口号,对于少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不无启迪^③。孙氏在檀香山四年生活中逐渐孕育出民主、

① 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和考证》,第133~136、139页;《孙中山在檀事略》,《革命文献》第3辑,第279页;Lyon Sharman, *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13-14。在校早晚祈祷,参加诗班,周日前赴圣安德烈教堂参加主日崇拜。

② 马究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3~5、7~9、193~195页,内附有孙氏于奥阿厚书院入学文件;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2集,第10页;迟景德:《国父少年时代与檀岛发展》,《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6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1,第408~411页,谓芙兰谛文开设华人教堂,孙氏时常出席。又谓孙眉为了阻止其弟参加周日崇拜,常于周末要求其劈柴。

③ 迟景德:《国父少年时代与檀岛发展》,第411~418页;张玉法:《孙中山在夏威夷》,《辛亥革命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3,第52~62页;Harold Z. Schiffma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12-13, note 14,说明夏威夷政局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民族的革新思想，难怪他日后一度说明其革新思想乃始源于檀香山“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①

少年孙中山即在其檀香山之旅，日渐累积识见，并且信仰基督。而在西方文化熏陶下的孙氏，显然具备了与传统中国相异的新文化视野。随着其重返故乡，南下香港，在具有通商口岸特质的英式殖民地，接受中英双语的现代中学及专上教育。其思想言行，随着中国国势的江河日下，遂开始产生了激烈的变化，此即由改革走向革命。

1883 年孙中山遭其兄遣返，怀着对基督教的信仰及所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知识，重返故乡翠亨村，顿觉故国的政治与社会，充满保守与腐败，更进而对于乡民的多神信仰及拜祭偶像起了反感，并与总角之交的陆皓东，双双进入乡民主神信仰的北帝庙，进行破坏。这位制造麻烦的“番鬼仔”^②，因而引起乡民愤怒而被迫离村，青年孙中山已然流露出反传统、反建制的造反者身影^③。随即赴香港，展开其人生的新一页。此即信教传教、结婚求学、习医成才以至于倡导革命，从而使香港成为清季革新运动的摇篮^④。

三 信仰、学医之地——香港与广州

（一）信教传教

受到乡民反对后的孙氏，与陆皓东同到香港。1883 年冬，入学香港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课余结识美部会传教士喜嘉理牧

-
- ①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 年 5 月 7 日，《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1982，第 359 页。
 - ② 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886，第 517 页。
 - ③ 陆灿：《我所了解的孙逸仙》，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第 7～11 页；陆灿为陆皓东之侄。又参见简又文《国父的青年时期》，《新希望》第 56 期，第 4～5 页。简氏记述略有出入，则谓孙氏与其家侄子游览北帝庙，并合力打断庙中神像一臂，借以验证其神性，此举乃破除族人迷信偶像的“革命”行动。
 - ④ 陆丹林：《总理在香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1 编第 9 册，1963，第 108 页；又孙氏前赴香港，乃因意奥兰尼旧同学唐雄正在香港，见 Carl T. Smith, “Sun Yat-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 *Ching Feng*, vol. XX, no. 3 (1977), pp. 155–156.

师 (Rev. Charles Hager, 1850 - 1917)^①, 表示慕道及受洗的决心, 遂于 1883 年底或 1884 年初以孙日新之名, 由喜嘉理牧师为其施洗于必列喏士街 (Bridges Street) 公理会布道所。信教后, 表现热心事奉, 引介二友陆皓东 (署名中桂) 及唐雄接受喜牧施洗, 加入教会, 并带领喜牧及一英人至澳门、香山一带宣教。时孙氏寓居于布道所二楼, 入学位于歌赋街 78 号的中央书院, 至 1886 年毕业后, 由喜牧推荐至广州博济医院习医^②。于其时得识该院医生及翻译医书的尹文楷, 并得其介绍认识尹氏外父区凤墀 (1847 ~ 1914), 区氏时为伦敦传道会广州传教站的传道人, 从而建交, 并拜区氏为师, 自此孙、区二人时常研究教理和谈论革命。翌年, 香港西医书院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成立, 受区氏推介, 回港入读西医书院, 并“引与煜初先生相识”^③。此即王煜初牧师 (1843 ~ 1902), 时主理道济会堂。此后孙氏遂于该堂聚会崇拜, 聆听王牧讲道, 据王牧之子宠惠 (1881 ~ 1958) 日后回忆, 谓孙氏“课余辄偕学侣陈夔石君 (少白), 与先君子相过从, 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二人相处, 恍若志同道合”^④。

1891 年春孙氏与教友共同创立少年会, 名之曰“培道书室”, 以此为“公暇茶余谈道论文之地”, 该会并透过“讲授专门之学”, 借以“联络教中子弟”, 上述活动乃求以教会的团契生活, 来维系教会中少年的信德, 借此“拨吾教于盘石之固也”^⑤。由此可见, 其时孙中山无疑是一位虔诚基

① 喜牧为美国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 的差会——美部会, 应三藩市华侨要求, 来港宣教。参见《喜嘉理牧师》, 刘粤声编《香港基督教会史》, 香港浸信教会, 1996 年重刊, 第 322 ~ 327 页; 并参见张建华《孙中山的施洗牧师喜嘉理》, 《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第 273 ~ 280 页, 并参见 C. A. Nelson, “Obituaries: Rev. C. R. Hager,” *Chinese Recorder*, vol. 48 (1917, Dec.), pp. 797 ~ 798。

② Charles R. Hager,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in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383 ~ 384; 孙氏施洗名册的原本影印, 见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 《广东文物》, 上海书店, 1990 年重刊, 第 100 页; 又参见 Carl T. Smith, “Sun Yat 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 in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8。

③ 尹文楷:《二十五年来之香港教会》,《真光》第 26 卷第 6 号, 1927, 第 7 页; 又孙区二人的交往, 参见宫崎寅藏《孙逸仙传》,《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 第 9 页。

④ 王宠惠:《追怀国父述略》,《困学斋文存》,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 1957, 第 1 页。

⑤ 陈建明:《孙中山早期的一篇佚文——教友少年纪事》,《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第 185 ~ 190 页。

信徒^①。而孙氏亦因此一基督徒的身份，日后取得沿海以及海外华人教会人士对其革命运动的支持^②。

（二）结婚求学

孙中山于檀香山信教而遭其兄的反对，遂被送返故里，中止在檀的求学。然回乡后随即南下香港，继续学业，先后入读拔萃书室及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期间于 1884 年 5 月 26 日（光绪十年四月十三日）奉父命返乡，娶同邑外壘乡（今珠海市外沙村）卢耀显之女慕贞（1867~1952）为妻，此其父谋以家室消弭孙氏的反叛性格，稍后诞下长子孙科（1891~1983）^③。

孙氏于 1883 年 11 月至 12 月间，就读于拔萃书室。该校乃 1860 年由圣公会会督四美（Bishop George Smith, 1815-1871）之妻，创设于港岛西营盘第三街。成立之初，专收女生，故名曰拔萃女学（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于 1869 年重组，改称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所收学生，以寄宿为主，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乃仿照英国公立学校体制而设。孙氏入学，乃透过夏威夷圣公会主教的介绍信入学。全班 25 人，其中 8 人为欧洲籍。入学不久，或因该校以寄宿为主，而孙氏走读，难有归属感，或因乃父生病而停学^④。继而转学中央书院。

中央书院于 1861 年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倡议创立，为一兼授中英双语的官立中学。共分 8 级，1~3 级为高中部，4~6 级为初中部，7、8 级为初小部，学生以华人及欧亚混血儿为主，兼收外籍，如日本、印度、葡萄牙、英国等。从其课程及考试科目观之，可

① 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及特质，参见周兴樑《孙中山与西方基督教》，《文史哲》1995 年第 6 期，第 74~82 页。又此一时期孙中山曾对宫崎寅藏提及信仰，谓对基督教信念，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随着科学研究而逐渐减退，觉得基督教缺乏逻辑，但没有完全放弃基督教。见宫崎寅藏《孙逸仙传》，第 12 页。

② Carl T. Smith, "Sun Yat 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 p. 87.

③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 37 页，据卢夫人函示谓于光绪十年（1884）结婚，另一说为光绪十一年（1885），见罗香林《国父之家世与学养》，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年重刊，第 32 页。今从卢夫人说。

④ 《拔萃学校》，刘粤声编《香港基督教会史》，第 196 页；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波文书局，1982，第 132 页；Carl T. Smith, *Sun Yat-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 pp. 156-157；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 33~36 页。一说入学只有一个月（1883 年 11~12 月），另一说入学约 5 个月（1883 年 11 月至 1884 年 3 月）。

见该校为学生提供以英文为主的中英双语教学,尤重西方史地、格致之学,及香港与中国现况的知识,务求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知识及中西文化视野的双语精英^①。孙氏即于1884年此一该校关键年份入读高中部,其时全校学生约为558人,至1886年毕业于该校^②。

孙氏于中学毕业前后,已经开始思考出路。由于信教,故有传教的想法;及至中法战争发生后,遂有投考军校报国之志;也曾考虑任职律师;但最终却选择投考医科。1886年经喜嘉理牧师的推荐,入读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所设的医校,并获减免部分学费,全年只交20元^③。从而展开其习医生涯,一年后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历经五年研习,取得行医的专业资格。

(三) 习医成才

孙氏于1886年入读广州博济医院。该院为美国公理宗差会——美部会差派来华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9)所创办。1835年伯驾抵粤推行医疗传教,于广州十三行的新豆栏街开设眼科医院,时称普爱医院,并着意将西方医术传入中国,培训华人医师。1853年,由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来华接手。1859年,始称博济医院。1866年在该院成立医校,1879年始收女生,成为华南地区最早的医院及医校。时由嘉约翰任院长,译写西方医书,著作等身,与伦敦传道会的合信医师(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同被推介为近代西方医学入华的

-
- ① 李金强:《香港中央书院与清季革新运动》,《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第251-259页;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48。
- ② Carl T. Smith, *Sun Yat-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 pp. 157-158。1884年该校发生四件大事:其一,12名学生被选至天津接受海军培训;其二,该校旧生成立奖学金基金,纪念首任校长史钊活(Frederick Stewart, 任期1862-1881年);其三,港督为该校于鸭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新校舍奠基;其四,首个留英的政府奖学金为该校学生所取得。又该校《黄龙报》(*The Yellow Dragon*)第37卷(1937),第94页,记述孙中山入学资料,包括学号:2476,姓名:孙帝象;住址:必列啫士街2号;入学日期:1884年4月15日;备注:父母在香山。
- ③ Charles R. Hager, *op. cit.*, p. 384,说明孙氏由决志奉献,计划攻读神学,以至最后转而习医的历程。并由喜嘉理牧师撰函,推荐给博济医院的医疗传教士嘉约翰(John G. Kerr, 1824-1901)医生。又参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商务印书馆,1945,第28页,谓孙氏受檀香山教会司铎杜南山(1854-1939)引述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名言的影响,遂生习医之念。

开山者^①。博济医院的医学课程以内科、外科、妇科、药学、化学、物理、生理学等基础学科为主。孙氏入学后，居住于哥利支堂 10 号宿舍。同学共有男生 12 人，女生 4 人。于习医外，自行研读经史，自置二十四史一部，并从陈仲尧习国学。于其时，得识同学郑士良（1863 ~ 1901），郑氏亦为基督徒，且与三合会具有渊源，为其日后革命同志^②。翌年得悉“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以其学课较优，其地亦自由”^③，遂至香港，转读该校，此即香港西医书院。

香港西医书院的创设，与伦敦传道会及其会友何启具有密切关系。伦敦传道会自 1843 年来港建堂宣教，早已注意医疗传教，该会医疗传教士合信等人相继在港开设医院、诊所，以华人作为诊治之对象。至 80 年代，由于华人求诊者众，遂计划兴建一所为华人服务的教会医院。而更重要则为华人信徒何启，为纪念亡妻雅丽氏（Alice Walkden），决定捐献医院建筑的全部费用，并明言交由伦敦传道会管理。故即进行建院，并以该会购得荷里活道与鸭巴甸交界地段 62A 作为院址及华人教堂之用，后者即为道济会堂之兴建。继而接受富商庇利罗士（E. R. Belilios, 1837 - 1905）捐献 5000 元作为购药之用。该院终于 1887 年 2 月 16 日正式启用，是为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的开办，开办后反应良好。时何启与该院义务医师孟逊（Patrick Manson, 1844 - 1922）及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 - 1926）均感有必要在本港展开医学教育，借以培训华人西医、护士，即在上述三位倡建者的推动下，并随即获得署理港督金马伦（N. G. Cameron）及港督德辅（Sir William Des Voeux, 任期 1887 ~ 1891）之支持，本地中外绅商亦热心捐货赞助，并获直隶总督李鸿章允为荣誉赞助人。筹备完成，终于 1887 年 10 月 1 日宣布成立香港西医书院，并以雅丽氏纪念医院作为该院的教学及实习之地^④。

①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 292 ~ 318 页；G. H. Choa,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 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77 - 78, 159 - 162。

②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 41 ~ 44 页；冯自由：《郑士良事略》，《革命逸史》第 1 集，第 37 ~ 39 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1985，第 229 页。

④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第 5 ~ 12 页；E. H. Paterson, *A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887 - 1987* (Hong Kong, 1987), pp. 19 - 25; D. M. Evans, *Constancy of Purpose: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887 - 198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 - 38; 王志信：《道济会堂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第 13 ~ 15 页。

新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乃依随英国医学院的模式，此即医学院设于医院之内，并由任职医院的驻院或私家医师参与教学工作，首任院长由前中央书院校长史钊活出任，孟逊为教务长，何启任名誉秘书。至1889年教务长改由康德黎出任，何、孟、康三人均于该院开科授课。香港西医书院采行五年制，以英语进行教学，课程内容及编制与英国医学院相同，主要包括自然科学（植物、化学、物理、生理学等）及医学（内、外、妇、产、药物各科及临床医术等），学生所习各科每年均须参加专业考试，完成所有课程及考试合格者，校方将颁授“香港西医书院内外科证书”的专业资格。1887年开办之初，共有12名学生入学，而孙中山即为其中之一^①。

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开办，区凤墀遂告知孙中山：“彼新设者强胜广州”，并建议转校，“乃为之介绍”^②。孙氏遂于10月3日入学香港西医书院^③。展开其习医生涯，并在该校“渡过一生欢乐的五年”^④。

香港西医书院首届入学学生，除孙中山外，尚有11人，其中一半中途退学，取得毕业文凭共有6人。包括孙中山、江英华（1892年毕业）、关景良（1893年）、刘四福、胡尔楷、王世恩（1895年）。6人中，孙氏与关景良（1865~1936）情谊最密，与江英华（1871~1943）则为同届毕业生^⑤。

在学期间，与关景良同住于该校二楼学生宿舍达五年之久。据关氏回忆，孙氏专心学业，非常勤奋，日间习读医书，夜间研习中文经史，时见中夜起床，燃灯诵读，尤好《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之《进化论》^⑥。而孙氏之学业成绩，日见优异^⑦，由

① Minute-book of Court,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hereafter as HKCM), p. 41, Minute-book of Senate, HKCM, p. 21; D. M. Evans, *Constancy of Purpose*, op. cit., pp. 37-38;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第13~34页；《香港早期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学术上的贡献》，《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第135~158页。

② 尹文楷：《二十五年来香港之教会》，第7页。

③ 关于孙中山于西医书院入学上课时间，前此罗香林认为乃1887年1月，陈锡祺则推考为9月。见陈锡祺《关于孙中山的大学时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43~44页；又近日黄宇和则考订为10月3日正式上课，见黄宇和《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学生书局，2005，第66~67页。

④ 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

⑤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第33~34页。

⑥ 据关景良口述，见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第201页。

⑦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第43~46页。第一学年（1887~1888），孙氏考试成绩名列第三，而化学、生理学两科，成绩为全级之冠。第二学年（1888~1889），所考解剖学及生理学两科，成绩为全级之冠。第四学年（1890~1891）所考法医学、公众卫生及实用初级外科，成绩均居冠。

是获得该校师友的器重。其中康德黎及孟逊对孙氏尤为赏识。康氏在港前后 10 年（1887 ~ 1896），于西医书院任职期间，除任教务长，负责院务外，并任教解剖学、实用初级外科学，又于课堂上推介达尔文之进化论，于课余时则组织后备兵团（Reserve Forces of Hong Kong）的救护队，由该院在校学生参与服务。而孙氏亦因此雅好进化论，并参与救护队，对救护原理及服务具有认识，二人由是建立深厚的友谊。孙氏毕业后行医，为病人施行手术，以至于投身革命，并于 1896 年为驻英使馆人员所掳，发生“伦敦蒙难事件”，皆得其师之援手。与此同时，孙氏又先后结识陈少白（1869 ~ 1934）、尤列（1865 ~ 1936）、杨鹤龄（1868 ~ 1934），四人时相聚会，皆敬慕洪秀全，言论反清，被时人目为“四大寇”，日后均为孙氏之革命伙伴^①。

经过五年辛勤的学习与实习，孙氏于 1892 年参加毕业考试，结果只有孙中山及江英华二人取得毕业资格，成为该院第一届毕业生，时孙氏之毕业试，所考科目共计 12 科，其中 10 科成绩取得荣誉，2 科取得合格^②。二人遂得院方评议会通过授予毕业文凭，而孙氏则获取成绩优异的荣衔^③。

1892 年 7 月 23 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创校以来的首届毕业典礼，为香港开埠盛事，中外男女嘉宾，冠盖云集，由港督罗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任期 1891 ~ 1898）出任主席，颁发奖品发表演说，由康德黎报告书院的创立意义及院务情况，随即颁发毕业文凭，而孙氏遂从其师康德黎手中获得医学及外科的毕业文凭^④。

该院并于同日晚上假柯士甸山酒店举行首届毕业生晚宴。该酒店位于海拔 1400 英尺太平山顶的维多利亚隘口，酒店建筑优美突出，会客厅、宴会

① James Cantlie and C. Sheridan Jones, *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pp. 27 - 46; 罗香林：《国父与康德黎先生》，《国父与欧美之友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第 5、14、23、32 ~ 48 页；黄宇和：《孙中山与英国》，第 75 ~ 76、89 ~ 92 页。又参见孙中山《红十字会救护第一法译序》，《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08 页；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 83 页。

②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第 48 页。孙氏考得荣誉成绩，分别为植物学、化学、骨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法医学、公共卫生、产科。两科考取合格成绩，分别为医学、外科。而江英华则 6 科取得荣誉成绩，6 科取得合格成绩，列居第二。

③ Meeting on 16th July 1892, Minute-book of Senate, HKCM, p. 89.

④ 毕业礼的盛况与过程，参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第 49 ~ 57 页。

厅陈设高雅，且俯览港岛西、南两面胜景，为19世纪下半叶香港三大著名酒店之一^①。是夜出席者除该院院长、员生、考试委员外，尚有殖民地政府，海军、陆军、后备兵团，以至本港各院校等人士，晚宴菜式丰富，计有鱼子酱三文治、餐汤、主菜、鱼、肉类、蔬菜、沙律、咖喱、糕饼、茶、咖啡，佳肴美食，宾主言欢。孙氏在晚宴代表毕业生做最后祝酒及致答谢词。他说：“感谢各位这么热情地响应我的祝酒，为了同学们和全香港的福祉，我谨祝愿母校兴旺发达”，受到与会者热烈的鼓掌^②。孙氏即在此一毕业夜宴中，在美食享用及觥筹交错的欢乐时光中，为其人生旅程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四 行医扬名之地——澳门

孙中山毕业后，未有工作。时港督罗便臣遂致书英国驻华公使，推荐孙氏及江英华二人，托其代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求职。李氏同意二人来京候缺，然终因向两广总督衙门报到时，受到诸多留难及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孙氏愤而放弃，折返香港^③。

孙氏随即转赴澳门行医，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澳门与香山、香港邻接，据孙氏自述就读西医书院时“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④。可见孙氏早已穿梭港澳，对于澳门极之熟识。由于西医书院毕业生不能在香港行医执业，故原任职香港法庭的澳门葡籍好友飞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协助孙氏进入澳门镜湖医院任职^⑤。又因孙氏毕业前，曾为澳绅何穗田、曹子基之家人治顽

① *The Hong Kong Guide 1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eprinted), pp. 77-78; 其余两间著名酒店分别为毕打街的香港大酒店，及皇后大道中的维多利亚酒店。

② 孙中山答谢词，见于 *China Mail*, 25 July 1892, vol. 6, 并参见黄宇和《孙中山与英国》，第147~148页；菜单见 *Cantile Papers*, M. S. 7937/7/1, Wellcome Trust Library, London.

③ 郑子瑜：《总理老同学——江英华医师访问记》，郑子瑜并写下按语，谓此段事迹，与革命之关键，至为重大，幸编述党史者留意之。

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⑤ 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澳门基金会，1999，第17~18页；飞南第原为出版世家，于1893年7月18日于澳门创刊《镜海丛报》，该报刊登不少关于孙中山早期活动的文章，成为研究青年时期孙中山的重要史料。参见姜义华《镜海丛报序》，《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第1~6页。

疾，遂得二人信赖，联同港商陈赓虞协助筹集资金开业，何氏又向广东著名进士赌商刘学询（1855～1935）推介孙氏，亦得其出手资助^①。1892 年秋冬间，孙氏分别于仁慈堂右街设写字楼接诊，称为“孙医馆”；于草堆街 84 号开设中西药局接诊，并出售中药、西药；于镜湖医院内设西药局，为贫民义诊，赠医施药，由于医术高明，备受当地官绅赞赏，相继于飞南第创办的《镜海丛报》刊登广告，交相称誉，包括广州海防同知魏恒、曹子基、何穗田、吴节薇等人，刊登孙氏行医成功病例及推介其高明医术，内外妇产各科疑难杂症均能妙手回春而“神乎其技”，孙氏由是誉满濠江^②。

正当孙氏医业蒸蒸日上之际，却遭到澳门葡籍西医所忌，起而排斥，并因镜湖医院司事及院内中医所忌，孙氏难以立足^③。孙氏谓：“予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④。只得易地迁至广州。

孙氏时在澳门为陈赓虞之父陈芳治病，陈芳原为檀香山富商，与其兄孙眉相熟。至此，建议孙氏至广州行医，并指示其向刘学询求助，筹开药房，推广业务，开通风气。孙氏遂至广州，并获刘氏慨助 1 万元。1893 年 9、10 月间先于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悬牌开业，继于西关冼基开设东西药局，刘氏为其“吹嘘”，并为孙氏引见两广总督李瀚章及地方官绅，由是孙氏“医名腾噪珠江矣”^⑤。稍后又于石岐分设药局，并邀聘任职博济

①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 61 页；陈肇琪：《总理史实访问记》，藏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号 030/90，此一访问记，乃陈氏亲至杭州，访问刘学询的口述历史。刘氏谓其出资 1000 两资助孙中山开业。又何穗田，原名连旺，又名廷光，与刘学询同为经营猜赌文、武科举中式姓氏——“闾姓”博彩业的赌商，后何氏为康梁维新派于澳门的重要支持者，任职澳门维新派所办《知新报》总理。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 398 页；又刘学询生平及与孙中山革命的关系，并参见何汉威《广东进士赌商刘学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 本第 2 分，2002，第 314～346 页。

② 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镜海丛报（影印本）》，第 1～3 页；冯自由：《孙总理之医术》，《革命逸史》第 1 集，第 15～16 页；又参见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 61～62 页，内引党史会藏《揭本生息赠药单》，谓孙氏由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借本银 2000 元，作为中西药局购药之用，并在该院赠医施药，作为借贷还息。

③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第 65 页；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第 6 页。

④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50 页。

⑤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 66 页；陈肇琪：《总理史实访问记》，参见冯自由《孙总理行医广告》，《革命逸史》第 1 集，第 10～12 页，录鸣谢广告及行医广告二则。

医院旧友尹文楷协助诊治病人，以“杏林双帜”作为广告，业务由是开展^①。

然而青年时期习医、行医的孙中山，并不以医业为其一生之所托。此乃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为外力所侵，国势一落千丈，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尤足令具有西方新知与热血胸怀的孙中山所不能接受，遂于香港习医之时，早已撰写革新言论的文字，对于农业改良，主张尤力^②。进而会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议论国事，言行反满。及至行医，继续邀集同志于广州城南之抗风轩，讨论时局，筹组革命团体。甲午战争之年，“上书李鸿章”，提出体制性改革而未果，知改革之无望，终于至香港创设兴中会总会，起而筹谋革命。此一时期，正如孙氏所说，其在香港时，已具政治觉醒，“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③。孙氏由是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先行者，而香港亦由是成为其革命思想缘起及倡导之地。

五 结论

省港澳为近代中国华南地区之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地域，异于传统的西方新生事物，陆续于此衍生。而近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故乡香山，即与省港澳相邻接，三地社会备受外来冲击，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活动亦由此孕育萌生。

青少年期的孙氏，既在香山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在侨居地檀香山开始其现代英语教育。并在此中英双语知识基础上，于回国后，借省港澳建设的海、陆交通网络，时常来回三地与故乡，由是涵濡于三地的滨海新文化与社会群体之中。于香港、广州接受中学及医科专业教育，继而执业澳门、羊城。在省港澳网络的近代新生环境中，学习西方新知，结识中外师友，其学识与人脉遂渐得以固建。

其时中国在外力入侵下，国势日见陵替，孙氏目睹原属边陲之三地，尤其是香港，经历西方文化洗礼后，人杰地灵，社会益见进步与优越。中外之

① 《洗基东西医局启事》，转引自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上册，第63~64页。

② 李金强：《孙中山之早期思想——农业改良言论探讨》，《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第145~161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高下，一目了然，遂起而倡导改良，而最终对清廷失望含愤，起而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投身革命，以香港为革命基地，策动边区武装起义，以澳门为革命活动据点及信道，并以广州为革命起义地点。最终推翻清王朝，结束两千年帝制，创建中国的民主共和。由此可见，省港澳三地，实为撰写孙中山传记者必须注意的地缘因素^①。

① 李金强：《同盟会时期（1905～1911）香港于革命运动中角色的探讨》，“纪念同盟会建立 140 周年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孙中山研究所，2005，第 20～22 页；张磊：《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澳门大学，1966，第 41～42 页；陈锡祺：《孙中山与广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 206～261 页。及至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三次建立政权于广州（1917、1920、1923），与北洋政府对抗。故辛亥革命前孙氏以香港为革命基地，而辛亥革命后则以广州为其革命基地。